

英國的中國學(下)*

近藤一成 撰

日本早稻田大學

王瑞來 譯

日本學習院大學

245-248.

劍橋大學東方學部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

劍橋的中國研究中心，是東方學部的中國學專業。學部的構成，除了沒有朝鮮學等一些不同之外，幾乎與牛津大學一樣。由於這種東方學部的結構本身可以窺見中國學在英國的地位，所以想簡單地介紹一下。

學部大體以地域分為中近東、伊斯蘭、印度、東亞四個部門。各部門內又細分為若干學科。在中近東部門，設置有希伯來學、阿拉米語、亞述學、埃及學（分為古埃及學和科普特語）；在伊斯蘭部門，設置有阿拉伯學、波斯學、土耳其學。此外，印度部門由梵語、古印度語、印地語、印度美術、考古學和東南亞史學組成；東亞部門由中國學和日本學組成。中國和日本，可以說是作為地域研究的一個課題而設置的學科。本科生首先選修一至二門與自己想學的專業有關的外語，特別是阿拉伯語、波斯語、土耳其語、希伯來語、中國語、日本語，現代語會話也是必修課。直至畢業，每學期考試都有聽力和口語的測試。選修漢語的學生，必須有一個學期（一年三學期制，通常是第三學年的第一學期）到母語為漢語的國家去實習。儘管時間長短不同，但各大學的中國學專業都有這樣的現地實習的制度。

劍橋沒有專門指定實習地點，學生一般都選擇北京、上海和臺灣的主要大學。但由於「天安門事件」，留學生幾乎全部撤回，1990年度，學部把臺北的臺灣師範大學國語研究中心作為派遣機關。普通的本科生是三年制，但中國學是四年制。一二學年學習現代漢語和古代漢語。第一學年的期末考試，除了漢語之外，還有中國文化史。在第二學年，考試內容有從漢到唐，以及從十九世紀到文革的歷史。第二學年結束，可以選修中國學以外的課程，諸如其他學部的法律、人類學等。中國學專業的學生，經過國外的語言實習之後，逐漸確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並開始

著手準備畢業論文。第四學年期末進行畢業考試。學生從現代漢語與哲學史有關的古典文獻韻文和小說等科目中自行選擇，參加考試。通過考試，並提交一篇一萬二千字以下的論文，即可畢業。學生數量各年不一，大體上一個學年十人到十五人左右。研究生人數很少，研究生院只招收博士生，不招碩士生。

專職教員有一位教授、五位講師。他們都有各自的專業研究方向。教授D.麥克馬倫 (McMullen) 是唐代專家，主要以科舉、教育制度、學術史（即Intellectual History）為研究對象。他在普利布蘭克門下長期擔任講師，1989年昇任教授。講師P.克拉托布爾 (Kratochvil) 的專攻是現代漢語，主要領域為實驗語音學。M.劉易斯 (Lewis) 的專攻為漢代史，現在的課題是文化學術史。M.洛伊 (Loewe) 的專業是古代史，1990年退休。他是「劍橋中國史」第一卷「秦漢帝國」的編者之一，以研究居延漢簡而知名。他退休後，中國學講師的編制減少了一人。J.麥克迪莫德 (McDermott) 的專業是宋至清社會經濟史和文化史。他於1990年秋，在洛伊退休之際，從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來頂替麥克馬倫昇任教授所空出的講師位置。R.斯勞斯的專業為現代漢語。他正利用計算機編纂中英辭典和從事人口統計學研究，並在著手建立大學圖書館中文書的數據庫。H.班迪班 (Van de Van) 的專業是中國近現代史，主要是早期中共黨史。像劍橋大學這樣在中國學領域充實史學的研究力量，從先秦到現代都配置專職教師，這在英國的大學中是獨一無二的。

劍橋大學的中國學，首任教授是托馬斯·韋德 (1888～1895)。繼任者有H.賈爾斯 (Giles) (1897～1928)、A.莫爾 (Moule) (1933～1938)、G.哈隆 (Gustav Haloun) (1938～1951)、E.普利勃蘭克 (Pulleyblank) (1953～1966)、D.特威切特 (Twitchett) (1968～1980)、G.達德布

* 續本刊12：3(47期)頁177-182 英國的中國學(上)

里基(Dudbridge)(1985~1989)，其間偶有空缺。然而，韋德不拿薪水，相當於名譽教授。¹⁵賈爾斯擔任教授長達十年以上，但據說只遇到一個想把漢語作為研究專業的學生。¹⁶德國萊比錫的中國學出身的哈隆來到之後，劍橋大學的中國學才成為名符其實的研究和教育機構。他運用嚴密的原文評論方法來進行早期經書的研究，培養研究者，並為大學圖書館制訂了系統的收藏方針。

劍橋大學圖書館的漢籍和中文書約有十萬冊，歸遠東部管理，由前面提及的艾爾摩負責。他是劍橋中國學出身，曾留學於北京大學。同一部門負責日文書的是小山騰。劍橋大學收集的日本有關中國的研究書籍多得令人驚嘆。這部分書也由小山負責。圖書館的四樓是中文書，五樓是日文書，全部開架，頗便利用，但各處都到了擺放的極限。日文書預定移入在院內新建的書庫。原則上開架的十九世紀以前的出版物，將作為貴重書。而且貴重書的指定範圍還有擴大的趨勢。圖書館規模的擴大，與使用的方便程度之間，在這裡似適成反比。

劍橋圖書館的收藏歷史，與牛津一樣，可以上溯到十七世紀。1632年巴津嘎姆公爵(Duke of Buckingham)贈送的一冊明版《丹溪心法》，據說是該館收藏的最早的漢籍。根據約瑟·埃德津斯的書目，該書的另一部分為波多利安圖書館所藏，大概過去同屬於荷蘭的收藏品。此後直到十九世紀中期，漢籍只是零散地入藏。1886年，韋德捐贈的四千三百多冊藏書成為這裡中國書收藏的實質性的起點。韋德把捐贈後也能自由使用藏書作為捐贈的條件，而他被聘為這裡的首任教授，則使他的願望百分之一百二十地達到了。這批藏書，除明刊孤本《異域圖志》和清初抄本《明實錄》等稀見書外，還有反映作為軍人、外交、法律方面的書籍。另外，太平天國的出版物，也是珍貴的資料。現在的韋德文庫，還包含有賈爾斯補充的據說是巴克浩斯藏品一部分的一千三百餘冊書籍。劍橋大學出版有賈爾斯編纂的《劍橋大學圖書館所藏韋德漢籍及滿文書目》(1898)和《補遺》(1915)。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斯圖爾文·洛克哈特(Stewart Lockhart)、阿奈斯道·阿拉巴斯特(Eenest Alabaster)的莫爾、哈隆兩教授等人的藏書的入藏，加之有計畫地採購，現在文史哲各類圖書皆備。此外，L. C.霍普金(Hopkins)捐贈的八百餘片殷商甲骨，也是有名的收藏。除了供研究之用的大學圖書館之外，作為供學習之用的圖書館有東方學部附屬圖書館。前不久，又收入了已故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教授有關蒙古的舊藏，大概很快就會弄清這部分藏書的內容。

談及劍橋中國學的時候，應當特提到的是李約瑟研究

所。憑著李約瑟博士的個人努力，依靠以美國為主的海外資金援助而經營的研究所，在行政上同大學沒有直接的關係，而以人際交流等形式，同東方學部有著一定的聯繫。1986年，在大學圖書館附近的魯濱遜學院內，建成一座新的建築物。這裡既是東亞科技圖書館，又是研究所編纂刊行《中國科學與文明》的基地。該書已經出版了十五冊。在今後十年間，預定把第五部《化學與化學技術》、第六部《生物學及其應用技術》的未刊部分和第七部《社會背景》併為第十六冊出版。分工已經確定，由七人專職擔任執筆和編輯工作。我對這個領域頗為生疏，聽說1990年召開了國際學術討論會，想必會有人專門介紹。

以上簡單地介紹了三所大學的中國學概況。在戰後，新設置中國學或是漢語專業的大學還有杜倫大學、里茲大學、愛丁堡大學。由於篇幅有限，就不在這裡介紹了。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三所大學和上述三所大學，再加上大英圖書館東方藏品部，一共七個單位聯合編纂出版了所藏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這個協作的組織者是全國收藏中文書圖書館的聯合機構。這個組織還合作編纂了十三個圖書館所藏中文期刊的聯合目錄(*Chinese local histories in British Libraries*, Oriental Institute Library, Oxford, 1979.)。像這樣對一部工具書的聯纂，既對學術界是個鼓舞，也為海外想要了解英國學的人提供了線索。

三

最後，還想簡單介紹一下前面多次提及的巴雷特教授的《英國中國學小史》。巴雷特於1986年由劍橋的講師就任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歷史系東亞史教授，最近據說將要出版Li Ao李翔：Buddhist, Taoist or neo-Confucian? (London Oriental Series, Vol. Oxford)一書。《英國中國學小史》是在提交給1987年夏SOAS召開的討論會報告基礎上寫成的。這次會議的論文集，即前面曾引用的British Library Occasional Papers 10: Chinese Studies, 1988. 一書，共收有二十五篇論文。此書對本稿的資料準備幫助很大。這次會議是由大英圖書館、SOAS圖書館以及前面提到的China Library Group聯合舉辦的。由此亦可以窺見這個組織活躍之一斑。此書以圖書館工作人員為對象，巴雷特的報告以Singular Listitude: some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為題被收錄在內。1989年，更改書名加入序文之後，單獨刊行。書名如果直譯的話，則為「不可置信的漠視」(Singular Listless Ness)。關於改用這一書名的理由，作者說是因為原稿引用了J.F.戴維斯的話。¹⁷由於改題是想準確地揭示本書的內容，因此，這

裡想稍加說明。戴維斯1813年任東印度公司駐廣東辦事處的秘書，並參加過阿默斯特使節團。不久，成為香港總督。他曾講述過當年英國向中國派遣馬夏爾尼使節時，居然在英國國內找不到一個翻譯的事，並說，對中國儘管抱有實利主義的興趣，但如此嚴重的漠視，卻反映出在理性水平上的無知。¹⁸實利性的興趣與學問上的漠視，他認為時至今日仍殘存著，所以用了戴維斯的話作為書名。

該書繼承了二十年前崔瑞德教授的觀點，對英國的中國學作了非常嚴厲的批評。¹⁹他從十六世紀伊比利亞半島的中國學開始，將荷蘭、法國、德國、俄國及北歐、美國也納入視野加以比較，考察各個時代對中國書的收集和中國研究的狀況，結論是，在全世界中國學的範圍內，英國並沒有做出應有的成績。由於這個結論過於否定英國中國學的成就，讀者反而產生一種想要為之申辯的心理。現在儘管情形已有改變，但還是能列舉出一些各個時代都存在、適足形成戴維斯否定性見解的現象，例如非正規化。

在十九世紀，創立世界上最早的中國學講座時，佔據講座教席的是退休的傳教士和外交官。他們本來就不是受過嚴格學術訓練的學者，也不曾有過充分的時間從事研究教育。崔瑞德教授寫道，與同時期歐洲的學者相比也並不遜色的大學學院的中國佛教學權威貝爾（Beal）教授，同時還是繁忙的教區司祭；從事許多工作的國王學院教授道格拉斯，且不論其水平，但他的活動中心也是在兼職的大英博物館。他編纂的各種目錄，被賈爾斯認為是門外漢的紀念碑。

到了本世紀三十年代，儘管非正規化的學者有所減少，但壓抑學院派的風氣依然沒有改變。因此說，就像已經提到過的本世紀初的瑞里委員會的報告，對於戰後英國的東方學來說，這種諮詢委員會的報告仍具有重要意義。1946年的斯卡波羅報告，根據戰時的經驗，建議有必要加強東方各種語言的教學工作，並希望在中國學領域培養人才和充實圖書。這個報告有實際意義的部分被實施。此外，1961年的海德報告，建議引入美國的地域研究的方法，設置以現代中國為對象的地域研究中心。里茲大學中國學科的設立，正是這個報告的結果。從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柴契爾政權下，掀起了一股強烈的排除非實用性學問的風潮。而在1986年提出的關於促進東方和非洲諸語言及相關地域研究的報告，正好給了在這股風潮之下的中國學喘息的機會。這一點已有定評。但在促進東方和非洲諸語言及相關地域研究的報告提出之前，中國學也被附加有「要適應貿易、外交的需要」這樣的條件，對中國學從實用主義出發加以強求。

在中國學領域，實用主義同中國學與生俱來，一直佔

據著主導地位。實際上，把政治、外交、貿易的需要作為前提，這在歷次的報告中都是不言自明的，而中國學自身發展所要求的學科和領域，卻未能無條件地加以推進。如此說來，批評英國的中國學做學問流於趕時髦、非正規化，也是理所當然的。非正規化這一點，現在儘管改變了形態，但依然是英國中國學的桎梏。

英國在中國書籍的收藏方面，比起荷蘭、德國、法國要落後。對於中國書籍的收藏，有人說美國在1974、75年時的收藏，就已經超過了十年後英國的收藏水準。儘管如此，英國的收藏還是在三個領域有其特色：

第一，為傳統的中國學所忽視的通俗文學資料。1761年出版的《好逮傳》（*the Pleasing History*）的英譯本，在1719年就已經基本完成。這是歐洲最早的中國通俗文學翻譯。站在貿易和外交的角度，為了瞭解中國人的思維和行為方式，比之四書五經，讀小說則似乎更為簡捷。到了十九世紀，出版了大量的譯本。與此相應，這類書也被加入收藏。

第二，是太平天國以及三老會等民眾暴動的資料。

第三，就是眾所周知的敦煌卷子、英中關係史的資料，因多係英文，這裡從略。

然而，利用上述資料，特別是後兩類資料，取得研究成果的，卻大多是英國人以外的學者們。而且回顧歷史，如果離開了以各種形式參與的外國人，就構不成英國的中國學史。此可舉例言之。在第二節提到過的沈福宗，曾協助海德翻譯經書。此外，充實了大英圖書館中國書籍收藏的王韜也是其中之一。在將正規的研究方法導入英國中國學的哈隆就任教授的半個世紀之後，從十九世紀就設置中國學的歷史悠久的三所大學，其教授位置才完全由英國出生的學者佔據，但這已是1989年秋天的事了。這件事本身就能說明一定的問題。

說到哈隆，崔瑞德教授曾有趣地指出，同倫敦大學的西蒙教授共同築成現在英國中國學基礎的這兩個學者，都是德國中國學出身的學者，這在前面已經提到。以這兩個人為代表的歐洲的中國學者，由於曾從學於中國的應試舉人，所以研究領域偏重於先秦的古典。這種偏重又被其弟子們繼承下來。另外就是原傳教士和外交官之類曾在中國實地活動的中國通。他們沒有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只是基於自身的體驗，憑興趣出發，從各式各樣的角度來研究當代中國。因此，英國中國學的視點，主要集中在先秦和當代這兩點上。除了宗教以及文學部分領域外，缺少漢以下直到明清各朝代的研究，從而妨礙了對中國歷史的系統性理解。

的確，外國人在英國中國學的形成和發展上，起了很

大的作用。即使現在，僅從中國學教員的國籍看，也顯示出一種國際性。現在，歐洲學者頻繁的人事流動，已超越國境，成為日常化。在這種狀況下還講什麼外國人的影響，似乎毫無意義。然而，不管怎麼說，英國存在著獨特的學術環境，中國學也置於其中這一點，則是筆者所深感興趣的。

該書強調不利的學術環境之一是財源問題。基德作為初任教授，年薪僅60英鎊。至於韋德，則不拿薪水。而莫里松擔任東印度公司翻譯的年俸卻達500英鎊，後增至1000英鎊。維多利亞王朝後期貴族的年金在一萬英鎊以上，紳士階層的平均年收入也在一千至三千英鎊之間。年收入60英鎊，僅相當於一個非熟練工人的最低收入。²⁰這並不是個別的例子。即使是現在，教師的收入也仍然很低。由於在商業機構剛就職的研究生的工資就比導師的收入還要高，所以，據說沒有人留下來從事研究工作。

政府和民間一貫對專業性的中國學不感興趣，在經濟上不積極支持。即使是關於促進東方和非洲諸語言及相關地域研究的報告提出以後，在柴契爾政權下被削弱的地位仍未得到很好地改善。由此看來，該書的目的是想把一百多年來中國學所處的困窘境況公諸於英國社會，這可能也是作者對英國中國學的評價過於否定的原因之一。²¹正如巴雷特教授本人所說的那樣，該書並不是對一個個事實所做的史料分析和匯編，大部分依據的是過去業已考證清楚的研究成果。因此，我在調查英國中國學的問題點時，該書作為參考文獻目錄，相當有用。

後藤末雄曾在《中國思想西漸法蘭西》一書中指出，對中國的認識，法國是通過在華天主教傳教士來完成的，而英國則是由航海家和商人來實現的。進入十九世紀，隨著新教傳教士的活動，英國對中國的認識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並且來自商業貿易領域和外交界的消息也大大增多了。英國這樣形成的中國認識，有別於法國那種來自傳教士的認識，坂野正高對此予以很高的評價。正如後藤所分析的那樣，十八世紀的法國，眾所周知，處於從絕對主義走向革命的大動蕩的時代。十七世紀以來，試圖朝著有利方向解決典禮問題的耶蘇會士，來自他們的中國消息，對於法國知識份子來說，不僅僅視為稀罕的海外逸事，還被看成是弄清法蘭西現在與未來的借鑑材料。如此說來，研究中國同研究法國並沒有什麼兩樣，中國學作為一種傳統的學問在法國落戶的過程，正是把中國研究作為自身的問題納入法蘭西精神史的過程。然而，英國則未曾有這樣一個傳教過程，因而在中國學問題上，為實利主義和異國趣味所困擾，也許是理所當然的事。

在BACS年會的餐桌上，鄰座一位曼徹斯特大學的教

師很反感地說，比之專業化，英國人更偏愛業餘性。他的話，我迄今還留有印象。崔瑞德和巴雷特兩人所說的業餘學者，是指未經過史料運用的訓練、不掌握目錄學知識就從事中國研究的人。從廣義上講，似乎是指不正規而言。在劍橋和倫敦，走進舊書店，尋找十九世紀出版的有關中國的書籍。這些書並不放在歷史或哲學的架上，而是放在地志和旅遊的書架上。這使我頓然感到像是走入了這個國家的中國學的原始狀態之中。對於他們來說，中國是一個遙遠的異文化的未知世界。這個世界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他們想知道，也想讓人們知道。但在尚未獲得如何實現這個目的的科學方法的狀態下，他們首先只是憑藉旅遊的經歷而言，他們有著中國是與自己身處的國家全然不同的世界這樣的認識，並有著把這個世界作為一個整體來探索的熱情。在我看來，這種認識和熱情迄今為止仍然是歐美中國學的基調。

在促進國際交流、並從各個方面都要求把中國研究自覺看作是一種外國研究的今天，接觸一下歐美中國學的原風景，或許也有一定的意義吧。回味著各處都能聽到的「業餘性」這個詞，遙望著多次經過的大英博物館，油然而升起一種感覺，這裡似乎正是一座巍峨的業餘精神的殿堂。

注釋

15. 關於韋德擔任教授的資料，最近披露了他的書信。Charles Aylmer, "Sir Thomas Wade and the Centenary of Chinese at Cambridge (1888—1988)", 《漢學研究》7:2, 臺北, 1989年。
16. 此為給里委員會的報告所列舉的事例。見於前引巴雷特之書第85頁。
17. John F. Davis, Chinese Novels,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s, London, 1822.
18. 戴維在四十年以後的著作中也述說了同樣的感慨。Chinese Miscellanie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and Notes, III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England,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Present Century, London, 1865. 關於他對初期英國中國學形成的看法，詳見註1所示坂野的文章。
19. 見於崔瑞德講義（註5）。這個講義，高度評價了六十年代初日本學者利用敦煌、吐魯番文書在土地制度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並以此相對比，以倫敦大學為主，回顧了十九世紀以來的英國中國學。
20. 關於維多利亞朝後期各階層的平均收入，參見長島伸一的《大英帝國》（講談社現代新書，1989年版）第40頁以下。

（文下轉至第244頁）